

## 莫高窟第 401 窟初唐菩萨立 像与《大通方广经》

赵晓星

(敦煌研究院 文献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莫高窟第 401 窟是隋代第三期洞窟,主室四壁下部与西壁正龕内初唐绘制了 31 身菩萨立像。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敦煌文献与现存佛教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菩萨群像可能是根据《大通方广经》绘制的,主要表达了忏悔的意涵。这类菩萨群像出现在隋末唐初,并对以后的壁画题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第 401 窟;初唐;大通方广经

**中图分类号:** K879.41;B9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0)05-0047-06

## A stud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s wall-paintings in Cave 401 Mogao Grottoes and Sūtra on the Universal Ornament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ZHAO Xiao-xing

(The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Cave 401 Mogao Grottoes dating from the third phase of the Sui Dynasty. There were 31 standing Bodhisattvas were painted by the early Tang dynasty on the lower part of four walls and as screen-painting inside of the niche western side wall. Based a thoroughly investigation in-situ and references o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Buddhist Sūtra, this article took for granted that these standing Bodhisattvas images were adopted from Sūtra of the Universal Ornament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to expression of repentance. The illustrations to Sūtra of the Universal Ornament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appeared at later Sui Dynasty and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had great influences to the latter Dunhuang art.

**Keywords:**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Cave 401; The Early Tang Dynasty; Sūtra of the Universal Ornament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收稿日期:2009-08-20

基金项目: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敦煌隋代图像研究”

作者简介:赵晓星(1980—),女,吉林省梅河口市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莫高窟第 401 窟属于隋代第三期洞窟<sup>[1]</sup>,主室四壁均有部分初唐壁画,内容为说法图与菩萨立像。南壁西侧方口斜顶圆券龕初唐画卷草佛光、六菩萨、二飞天、二赴会佛、一持花供养童子,东侧残;东壁门上、门南中部、南、北两壁龕下各有初唐所绘说法图一铺,门北中部绘阿弥陀佛一铺。东壁

门南说法图右上角有禅定佛一身、男供养人一身,南壁说法图下有男女供养人各两身。窟内四壁下部与正龕外层龕南北壁下部有初唐所绘菩萨共 31 身,加上南壁西侧隋代所绘 3 身,共 34 身,全部为站立姿态,在这些菩萨中有 12 身的榜题尚可释读,具体情况如下:

	位 置	姿 态	榜 题
西 壁 龕 内	南壁西起第 1 身	面向外侧,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拈莲花于面前。	无
	南壁西起第 2 身	面向内侧,左手于胸前执净瓶,右手于右肩上扬柳枝。	无
	北壁西起第 1 身	面向外侧,左手于面前拈指,右手拄于胯上。	无
	北壁西起第 2 身	面向内侧,左手置于腰间拈瓔珞,右手托玻璃碗于面前。	无
西 壁 龕 下 由 南 向 北	第 1 身	左手提净瓶,右手上举执莲花,花上似有宝珠。	模糊
	第 2 身	面向北侧,侧身而立,可见背部与二分之一侧面,右手上举置于胸前托披帛。	无
	第 3 身	面向南侧,微微下视,左手竖起前伸于胸前(模糊),右手自然下垂执披帛。	无
	第 4 身	面向北侧,较为模糊。	无
	第 5 身	面向北侧,较为模糊。	无
	第 6 身	面向北侧,左手置于胸前,右手垂下,较为模糊,面前有榜题。	文殊师利菩萨
	第 7 身	面向南侧,左手搭胸前,右手自然垂下,面前有榜题。	妙音菩萨
	第 8 身	面向南侧,左手拄胯上,右手于面前摊开。	无
	第 9 身	面向南侧,左手置于腹前,右手置于面前,较为模糊。	无
	第 10 身	面向南侧,左手置于胸前,右手于面前似拈莲花。	无
	第 11 身	面向南侧,侧身而立,可见背部与二分之一侧面,双手于面前似托玻璃盘。	无
	第 12 身	左手自然下垂,右手于面前执柳枝。	无
北 壁 下 部 由 西 向 东	第 1 身	面向西侧,左手握莲花于胸侧,右手拈花于胸前,身后有榜题。	满月菩萨
	第 2 身	面向东侧,左手下垂似拈物,右手下垂掌心向外,面前有榜题。	大力菩萨
	第 3 身	面向西侧,左手托物于胸前,右手自然垂下。	无
	第 4 身	面向西侧,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执同一莲茎,茎上莲花中有宝瓶盛宝珠。	不等[观菩萨]
	第 5 身	面向西侧,左手垂下执披帛,右手托玻璃碗,面前榜题模糊。	[定自在王菩萨]
	第 6 身	被穿洞毁去大部分,仅见右手提净瓶,面前有榜题。	法自[在王菩萨]
	第 7 身	被穿洞全毁。	无

括号内文字根据俄国鄂登堡探险团拍摄照片对出(以下同),见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俄藏敦煌艺术品》(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260—262 页。

东 壁	门北北起第1身	面向北侧,左手执莲花于胸前,右手上扬于面前,面前有榜题。	常举手菩萨
	门北北起第2身	面向北侧,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执同一莲茎,莲花上有宝珠,面前有榜题。	常下手菩萨
	门南北起第1身	面向南侧,左手托莲花,右手执披帛,头后有榜题。	虚空藏菩萨
	门南北起第2身	面向南侧,左手下垂提披帛,右手执莲茎,茎上莲花上宝瓶盛宝珠,面前有榜题。	辨音菩萨
	第1身	面向西侧,侧身而立,可见背部与二分之一面部,手势模糊,面前有榜题。	□□菩萨
	第2身	被穿洞全毁。	无
	第3身	面向西侧,左手执披帛,右手置于胸前,面前有榜题。	迦叶菩萨
	第4身	面向西侧,双手托盘于面前,面前有榜题。	模糊
	第5身(隋代)	面向西侧,左手自然下垂模糊,右手举于胸前作说法印。	无
	第6身(隋代)	面向西侧,左手拈莲花于面前,右手垂下执披帛。	无
	第7身(隋代)	面向西侧,左手下垂提披帛,右手托莲花于腹前,面前有榜题。	模糊

在这34身菩萨中,有8身菩萨的榜题现存清晰完整的文字,即文殊师利菩萨、妙音菩萨、满月菩萨、大力菩萨、常举手菩萨、常下手菩萨(图版24)、虚空藏菩萨、辨音菩萨(图版25);另有3身菩萨的榜题根据《俄藏敦煌艺术品》中刊布的照片亦可确定,即不等观菩萨、定自在王菩萨(图版26)和法自在王菩萨;有1身榜题仅隐约可见“叶”字,可能为“迦叶菩萨”。

这些菩萨共同出现、较为集中的佛教经典至今只发现一部,即《大通方广经》。《大通方广经》又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方广灭罪成佛经》,作者不详,3卷,是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被列入疑伪经之列。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考证此经名见于《法经录》、《仁寿录》和《开元录》,“此经首见于《法经录》,其后各经录登录不一。已佚”<sup>[2]</sup>。实际上,在敦煌遗书和日本存有此经的写本数件,方广钊在《敦煌学大辞典》中有简明介绍,“此经系《佛名经》之亚流。谓持诵佛名、忏悔发愿可灭罪得福云云。自《法经录》以下,历代经录均判伪经。陈文帝有据此经而作的《大通方广忏悔文》,据此,当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卍字续藏》收入传入日本之此经的卷上,《大正藏》将《卍字续藏》之卷上,汇合敦煌本卷中、卷下收入第85册。此经对研究南北朝时期之佛教信仰情况有重要价值<sup>[3]</sup>。”日本学者牧田谛亮亦撰有《大通方广经管见》<sup>[4]</sup>,对此经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第401窟的菩萨名称在此经的卷上部分,主要集中在诸大菩萨名的第一部分,为了体现他们

在经文中的关系,现将其加下划线标示如下:

南无十方无量诸大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得大势菩萨。南无常精进菩萨。南无不休息菩萨。南无宝掌菩萨。南无药王菩萨。南无药上菩萨。南无勇施菩萨。南无宝月菩萨。南无月光菩萨。南无满月菩萨。南无大力菩萨。南无无量力菩萨。南无越三界菩萨。南无颯陀婆罗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宝积菩萨。南无导师菩萨。南无德藏菩萨。南无乐说菩萨。南无龙树菩萨。南无宝檀华菩萨。南无上行菩萨。南无无边行菩萨。南无安立行菩萨。南无净行菩萨。南无陀罗尼菩萨。南无金刚那罗延菩萨。南无常不轻菩萨。南无宿王华菩萨。南无喜见菩萨。南无妙音菩萨。南无德勤精进力菩萨。南无无尽意菩萨。南无净藏菩萨。南无净眼菩萨。南无普贤菩萨。南无妙德菩萨。南无慈氏菩萨。南无善思议菩萨。南无空无菩萨。南无神通华菩萨。南无光英菩萨。南无慧上菩萨。南无智幢菩萨。南无寂根菩萨。南无愿慧菩萨。南无香象菩萨。南无宝英菩萨。南无中住菩萨。南无制行菩萨。南无解脱菩萨。南无法藏菩萨。南无等观菩萨。南无不等观菩萨。南无不等观菩萨。南无定自在王菩萨。南无法自在王菩萨。南无法相菩萨。南无光相菩萨。南无光严菩萨。南

南无大严菩萨。南无宝积菩萨。南无辩积菩萨。南无宝手菩萨。南无宝掌菩萨。南无宝印手菩萨。南无常举手菩萨。南无常下手菩萨。南无常惨菩萨。南无喜根菩萨。南无喜王菩萨。南无辩音菩萨。南无虚空藏菩萨。<sup>[5]</sup>

由经文可知,这些菩萨在经中的位置与在第401窟中的位置基本符合,如满月菩萨与大力菩萨、定自在王菩萨与法自在王菩萨、常举手菩萨与常下手菩萨、辩音菩萨与虚空藏菩萨这四组,无论是在经文中还是在壁画上,都处于相邻的位置。这种位置的一致性或者可以说明第401窟中的菩萨是依据《大通方广经》绘制的。此外,南壁东起第3身菩萨榜题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叶”字,可能是经中提到的“迦叶菩萨”。

《广弘明集》记载南朝陈文帝(560—566)曾作《大通方广忏文》:

菩萨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宝。窃以诸佛刹土不可言说,如来称号无有限量。或过去见在,共取颇罗之姓;或同时异世,俱有释迦之名。或明王十亿,或燃灯三万,去来三界遍满十方。闻名者离尘,受持者得道,其为功德难用思议。释迦如来以无碍力游娑罗之净道,止吉祥之福地,宝池化生自踊。说大通方广,出三宝名号,譬如六天总归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业,常以万邦有罪责自一人,四生未安理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仄忘劳,精进为心夜分未息,菩萨行处皆愿受持,诸佛法门悉令如说。欲使普天率土,无复怖畏之尘;蠕动蛸飞,永得归依之地。今谨依经教,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广忏悔,读诵百遍右绕七匝。涂香末香,尽庄严之相;正念正观,罄精恳之心。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方广经中所说三宝名字。愿诸佛菩萨寻声讞响,放净光明照诸暗浊,施清凉水灭兹渴爱,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总万有而会真如,齐三界而登实法。稽首敬礼常住三宝。<sup>[6]</sup>

据此,从史籍上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陈朝时代。从各种经录来看,开皇十三年(593)《众经目录》、仁寿二年(602)《众经目录》、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十八年(730

年)《开元释教录》、贞元十六年(800)《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均有著录,并将其收入相应的疑伪经类。另外,开皇十七年(597)《历代三宝记》记其“世注为疑”<sup>[7]</sup>,日本宽治八年(1094)《东域传灯录》中记有“大通方广经疏一卷”<sup>[8]</sup>。由此可见,依据此经而形成的忏悔法可能在南朝陈时已有,而此经最为盛行的时代应是隋唐,并曾有过专门的注疏。

从这部经典的现存情况来看,《大正藏》第85册收录经文共3卷,其中上卷来自松本文三郎博士藏敦煌模写本,中卷来自大谷大学图书馆藏本,下卷来自京都知恩院藏天平写经本。《大正藏》是将三个不同的写卷拼成全经的3卷,但中卷卷首因文献本身残缺,所以缺失了部分文字。上山大峻在《敦煌出土〈大通方广经〉とそのチベット訳》一文中,指明了《大通方广经》的来源及构成,列出了敦煌遗书中此经的汉文本、古藏文本编号,并据敦煌文献复原了中卷卷首缺失的部分,深入讨论了此经的吐蕃译本<sup>[9]</sup>。敦煌遗书中共有《大通方广经》汉文写本34件,英藏8件:S.0099、S.0538、S.1847、S.4553、S.5428、S.6328、S.7588、S.8128,国家图书馆藏16件:北8212、北8213、北8214、北8215、北8216、北8217、北8218、北8219、北8220、北8221、北8652、北8653、北8673、北8690、北8691、北8697;俄藏8件:Дх.00180、Дх.01180、Дх.02597、Дх.02980、Дх.06130、Дх.06134、Дх.06135、Дх.06193;大谷大学图书馆藏1件,旅顺博物馆藏1件。其中,9件文献可以拼接,分别是北8215+北8220、北8216+北8217、Дх.02597+Дх.02980(Дх.00180、Дх.01180与此2件属同一文献,但中缺数字无法拼接)、Дх.06130+Дх.06134+Дх.06135,此外,根据笔迹,北8673和北8690号应属同一文献,但中缺数字,无法拼接。这些文献中,根据北8221和S.6382可以补录出《大正藏》中《大通方广经》中卷卷首所缺文字,大约3200余字。从现存的这些敦煌汉文《大通方广经》中,暂时还无法恢复成出于同一写卷的一部完整的《大通方广经》,只能有待于以后文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而敦煌文献中的《大通方广经》的藏译本,因不涉及本文主题,暂不论及。2000年,在房山石经中也发现了《大通方广经》卷中部分,发现者也提到汉文《大通方广经》与现存藏文《圣大解脱经》为同一经典<sup>[10]</sup>,这使《大通方广经》的文本研究又更进一步。根据上山大峻先生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整理记



录<sup>[11]</sup>,这些文献从南北朝时期一直到晚唐归义军时期均有流传,时代明确的有题记的写本是隋代的。

其中,收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的文献,题记为:“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二十日,清信女董仙妃稽首和南十方一切宝,今谨为亡夫曹雅造此经一部流通供养。愿亡夫承此善因,游魂净土,面睹诸佛。永离三途,长超八难。耳餐法音,心悟智忍。普共六道,同向菩提。”S.4553有题记:“大隋仁寿三年(603)二月十四日,清信女令狐妃仁,发心减割衣资之分,敬写《大乘方广经》一部,愿令七世父母及所生父母,见在家眷,所生之处,值闻佛法,与善知识共相值遇。命过已后,托生西方无量寿国,及法界众生,同沾斯福。清信女任是是亦劝化助写供养。妃仁息,男吕胜遵持心供养。息女阿谟,存心供养,并愿同上愿。”Дх.02985的题记:“伏惟经戒大业七年(611)八月八日,正信佛弟子寡(?)妇女赵仰为之女写《大通方广经》一卷,共翟恩子卷合为一部。又愿立者不迺地狱、饿鬼等苦,复愿写经功德施无边法界,众生同沾斯福成无上道。”另日本滨田德海旧藏本有题记:“咸亨四年(673)十一月二十日,门下省群书手吴邵平写。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永监。”在这4条题记中,除了最后一条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伪题外,前3条可确定的题记都是隋代的,可以说明此经在隋代较为流行,并已经流传到了敦煌地区。因此,在隋末唐初的莫高窟中出现依据此经绘制的菩萨形象在时间上也就较为契合。

莫高窟第401窟是较早在四壁下部绘制成排菩萨立像并保存了清晰菩萨名称榜题的洞窟。根据莫高窟现存隋唐洞窟的情况,这种形式属于隋末唐初莫高窟壁画的新题材,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中晚唐洞窟。莫高窟隋代第379、397窟,初唐第204、209、323、332、338窟,晚唐第14、138、196等窟都出现了类似的成排带有榜题的菩萨立像。

最早出现这种形式的菩萨立像是在隋代第三期的莫高窟第379窟,现存菩萨仅见于北壁,保存至今的共有8身,所有菩萨现均可见榜题条,但字迹脱落。与第401窟情况最为接近的是第397窟,同属隋代第三期洞窟,这些菩萨立像为初唐所绘,共40身(东壁6身,南壁11身,西壁12身,北壁11身)。初唐第204窟的菩萨立像也与第401窟的同类形象非常接近,四壁下部共存菩萨立像54

身(东壁10身,北壁16身,西壁12身,南壁16身)。初唐第209窟也有相似的菩萨立像(南壁10身,北壁11身),只是并未在四壁下部尽绘,仅见于南北两壁,现仍可见部分榜题位置,字迹全部脱落。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第332窟西壁佛龕下保存的14身菩萨立像,至今仍有部分榜题清晰可见。现存可释读的榜题有:□无跋□□罗菩萨摩诃萨(南起第2身)、南无香象菩萨摩诃萨(第3身)、□无越三界菩萨(第4身)、南无大力菩萨(第6身)、南无药上菩萨(第7身)、摩醯首罗天王之像(第8身)、南无……之像(第9身)、南无自□王菩萨。其中,榜题“摩醯首罗天王之像”的图像仍以菩萨的形象出现,除“摩醯首罗天”不见于《大通方广经》之外,其他诸菩萨名均见载于《大通方广经》,并同样位于经中诸菩萨名的第一部分。这一点或者可以说明,初唐时期这些有榜题的菩萨立像是根据《大通方广经》绘制的可能性非常大。

另外,第397、204窟的这些菩萨立像无论从人物形象、艺术风格,还是姿态、持物都与第401窟特别接近,只是体量较第401窟稍小,也正是从这三个洞窟中可以看出,这种四壁下部尽绘菩萨立像的形式在初唐时期较为流行。同时代的第338窟南北壁现可见初唐所绘菩萨共17身(南壁11身,北壁6身),南壁上还有被晚唐壁画所覆盖的15身,南壁原应有26身菩萨立像,其形象也与前三个洞窟较为接近,只是此窟南壁菩萨排列紧凑,北壁体量稍大较为松散,不及前三个洞窟那样规律。在这些洞窟中,《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这些菩萨立像均标示为“供养菩萨”,但从洞窟的保存情况来看,这些菩萨原来均应有相应的榜题标示具体的名称,而不是普通的供养菩萨。只是除第401、332窟外,其他诸窟中的榜题已无法释读。

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北两壁现存菩萨立像共14身(南、北壁各7身),这些菩萨形象比前者更为高大,原来也有榜题,字迹现不存,无法释读。笔者认为,此窟的这种菩萨立像也应是受隋末唐初绘制成排菩萨像的影响,但在这时又有了新的内容与突破,因为这种体量较大的菩萨立像在晚唐时期似乎更为流行。晚唐第14窟四壁下部现存菩萨立像共51身(东壁8身,南壁16身,西壁11身,北壁16身),第138窟南、西、北三壁下部现存立佛与菩萨共38身(南壁13身,西壁18身,北壁7身),第196窟南、北两壁共存菩萨立像30身

(南、北壁各 15 身)。这三个晚唐洞窟保存了部分菩萨的题记,较为清晰,可以释读。从这些题记来看,这些菩萨或佛不属于《大通方广经》系统,而是出于其他经典。但是这些立佛与立菩萨,可能还是延续了隋末唐初以来的绘画形式。

那么,第 401 窟为什么要在四壁下部绘制这些菩萨立像呢?从《大通方广经》的内容来看,整部经都在讲忏悔灭罪,在菩萨名部分,还特别提到“若人闻是诸大士诸大菩萨摩訶萨名者,是人四十千劫中,不堕地狱苦,不属三界狱,常属解脱王”,并称“说是诸大菩萨名时,八十亿清静信男女悟阿那含果,九十四亿诸天得斯陀含果,七千八亿失心比丘还得本心悟阿罗汉果,十亿菩萨得大陀罗尼,来世成佛道”<sup>[5]</sup><sup>[1345]</sup>。仓本尚德在《〈大通方广经〉の懺悔思想》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大通方广经》经文各部分的具体来源,并重点讨论了其中的忏悔思想,及此经与《涅槃经》的关系<sup>[12]</sup>。莫高窟第 401 窟绘制这些菩萨的目的应是结合相应的忏悔法,来“除无量劫以来生死重罪”,时代早于第 401 窟的山西博物院藏 562 年的“陈海龙造像碑”可作为此类忏法流行于 6 世纪的例证。仓本尚德在《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大通方广经〉の成立と受容》文中阐述了《大通方广经》的创作与流行,并指出“陈海龙造像碑”中的佛菩萨名来自于此经,同时还指出敦煌文献 S.4494 中有方广忏的断片<sup>[13]</sup>。王静芬《佛名与忏仪》一文中专门研究了“陈海龙造像碑”与中国 6 世纪流行的忏仪<sup>[14]</sup>。

既然 6 世纪在中国已有与《大通方广经》相关的忏仪与造像碑实物,那在隋末唐初的敦煌石窟中存在相关的图像也就非常合理了,特别是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数量可观的此类文献。因此,笔者认为莫高窟第 401 窟的初唐菩萨立像的绘制与当时流行的方广忏法密切相关。而同为初唐所绘的五幅说法图,其含义可能仍与此经有关,经中世尊同样称唱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名,并一再强调要向十方三世诸佛忏悔,所以说法图可能是十方三世诸佛中的一些代表,如东壁门上倚坐的可能为弥勒,北壁龛下有弟子可能为释迦,南壁龛下的则可能为过去佛,如此三世俱全。另据《莫高窟形》中的“画记”记载东壁门北中部为“阿弥陀佛”<sup>[15]</sup>,阿弥陀佛是西方世界的教主,具备“方位佛”的特征,或许是十方佛之一的体现。正如经中所说:“是故汝等应当礼敬如是十方三世诸佛名号之者,汝于

来世当为大众开阐道教广济群盲令出三界。”<sup>[5]</sup><sup>[1355]</sup>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莫高窟第 401 窟的初唐图像应是根据《大通方广经》的内容绘制,与隋唐时代流行的方广类忏悔法密切相关,在隋代洞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一直影响到晚唐时期。

- 
- [1]樊锦诗,关友惠,刘玉权.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M]//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79.
- [2]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72,113.
- [3]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733-734.
- [4]牧田諦亮.大通方广经管见[M]//野上俊静.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续).京都:大谷大学东洋研究室,1972:59-66.
- [5]大通方广忏悔灭罪成佛经:卷上[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8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343.
- [6]道宣.广弘明集·启福篇序[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33.
- [7]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 13[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9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12.
- [8]永超.东域传灯目录[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147.
- [9]上山大峻.敦煌出土《大通方广经》とそのチベット訳[C]//龍谷大学論集,第 445 号.京都:龍谷学会,1995:53-89.
- [10]圣大解脱经简介.<http://wenku.baidu.com/view/6adfebd126fff705cc170af8.html>.
- [11]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2008.
- [12]倉本尚德.《大通方广经》の懺悔思想——特に《涅槃经》との関係について[J]//東方学:117.東方学会,2009.
- [13]倉本尚德.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大通方广经》の成立と受容——同經石刻佛名の新発見[J].中国哲学研究:第 23 号.東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2008.
- [14]王静芬.佛名与忏仪——以张荣迁碑和陈海龙碑为中心[J].张善庆,译.敦煌研究.2010(2):6-16.
- [15]石璋如.莫高窟形[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1996.